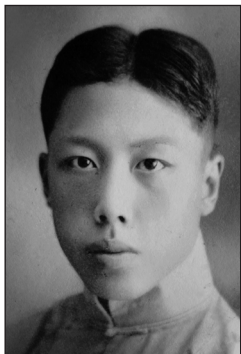


百岁忆清华

○张育琴（1936入学，物理）



张育琴学长入清华时的照片

张育琴，现用名张达干，山东胶南人，1920年出生。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为清华大学十二级。“七七事变”后被迫停学，后在山东参加革命工作，任滨北中学校长，其间为我党培养了大批干部。1983年在山东医科大学离休。

193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发生在半年以前；一年之后，日本侵略者就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全面进犯我国。

在这个历史的夹缝中，我们十二级的莘莘学子进入清华园学习了。录取到这所闻名国内外、久已向往的高等学府，我们是何等的幸福啊！然而，日本侵略者已占领东北三省，进而侵入

冀东，威逼平津。面对战争灾祸的威胁，我们终日在岌岌可危的形势下，抢时间攻读。果然，随着卢沟桥头炮声轰鸣，我们美好的校园学习生活全部毁于一旦！

清华园的学习生活是短暂的，但它对我走向革命有过一定的启蒙和导向作用。以后，在我从事高教工作的时候，也常常回想起当年清华大学教学管理方面的一些好的制度和做法，从中得到教益和启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至今对清华怀有深深的感情，曾多次借赴京之机，回到“故园”，去科学馆看看当年上课的教室，到新斋825号旧日宿舍去参观流连，同青年学友攀谈；也曾走访工字厅，从“水木清华”悬匾跟前的假山水塘边，漫步到大礼堂的石柱下和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心潮难平。每次看到母校的旧貌新颜，心中有



2000年校庆日，十二级毕业60周年庆祝会在工字厅举行，张育琴学长发言

无比的欢欣。

追忆清华园，首先想起的是老同学组织的、令人难忘的迎新工作。从接车站到注册报到、住进房间，都有大哥大姐们“一帮一”帮助落实。他们热情地告诉我们生活、学习的各种制度和应注意事项，使来自远方的新同学一进校园就立即沉浸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感到特别亲切和温暖。在迎新会上，曾举行了一次精彩的演出，高年级同学演出了一出话剧，剧中有首动人的《梅娘曲》，给我的教育、留下的记忆都很深。他们的演出几乎达到了职业剧团的水平。

当年的清华大学盛行“拖尸”，这是从美国学来的、老同学欺负取笑新同学的坏风气，使历届新生入校前闻而生畏，我们自然也不例外。想不到在十二级同学入校时，学生自治会明令禁止“拖尸”，虽还偶有发现，但基本上得到制止。此禁令大得人心。

“一二·九”以后的清华大学气象清新，朝气蓬勃，既有勤奋治学、刻苦攻读的老传统，同学们又极为关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关心国家兴亡和民族的命运。在地下党领导下建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起主导作用的学生自治会，在团结、教育、引导同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表现出相当高的组织能力。出色的迎新工作，迅速地吸引、团结了新同学的大多数，此仅为一例。

民先和学生自治会很注意结合实际进行抗日救国的形势教育。如组织由东北探亲返校的一位女同学向全校做了极为生动而感人的汇报；百灵庙战役以后，邀请自前线归来的傅作义将军到校作报告，还组织过支援绥远抗战的游行等。在发生了“西安事变”举国沸腾的紧张时刻，校学



2000年工字厅前与十二级校友合影。左起：周庆桐、董奋、曹宗巽、郑林庆、张育琴

生自治会召集全校同学开会讨论通电文稿。经过激烈的辩论，终于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正确意见，否定了极少数同学提出的，实为何应钦在南京叫嚷以所谓“讨逆”（继续扩大内战）的反动主张。大辩论的胜利教育了全体同学，并清楚地反映出当年清华同学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正气。

民先和学生自治会在清华所组织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注意针对同学的兴趣和要求，以老带新，组织各种科研社团，寓教育于专业学习与学术活动之中。我在物理系，参加了无线电研究会。记得指导我们的是本系四年级的戴中宸大姐（后名黄葳），南方人，个头不高，戴眼镜。她已临近毕业，忙于写论文，仍然按时到物理系实验室，教我们制造收发报机，在科研活动中，很自然地向我们讲抗战和革命道理。她老成稳重，热情待人，见地很高，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

文科同学活动领域更宽阔，对我们理科同学的影响也很大。我有两位中学学友在文学院高年级学习，也住在新斋，课余我常到他们房间里玩。有许多文学院同学经常去那里纵情谈论，从鲁迅、高尔基著作，到左翼文学动态；从巴金新作《家》

□ 回忆录

《春》《秋》《雾》《雨》《电》到青年的前途出路等等，无所不谈。有一位山东籍同学在最早排演《放下你的鞭子》中扮演青工，他去西山，在“一二·九”纪念活动中演出归来，也在那个房间里大谈一阵。当时的清华校刊办得很活跃，也有许多斗争，是文科同学经常谈论的话题。所有这些都使我这个初进大学的理科学生受到不少启发。

记忆中的清华园，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和探求真理的精神是极其感人的。后来，我在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从事中教和高教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重要问题，是党团组织如何结合教学和科研活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广泛地团结兴趣各异、觉悟不同的广大同学，完成培养任务。面对这一问题，我常回忆起当年清华大学地下党和“民先”出色的组织工作。我觉得有许多经验，至今仍有参考学习的价值。它是党的好传统，也是清华大学的好传统。

当年清华大学的历史背景、办学条件同今天差异很大，但在学校管理教学计划的安排、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学力量的部署等方面，有不少做法仍值得我们今天参考。



张育琴学长近照，与青年学生交谈

清华大学的新生，是在全国范围内择优录取的。新生入校后，学校继续采取措施，进行“人才苗本”的复壮和选择。第一，大一均为必修课，二年级及以后，转入选修及学分制。大一必修课中，除本专业相关的基础课和外语外，理工科必修大一语文及中国通史(工科同学可免修中国通史)，为培养高级理工人才打好知识基础。第二，安排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给大一上课。我所接触到的如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雷海宗、浦江清等国内知名的教授，均任大一教师。为理工科学生开文史课，安排教师也同样认真不马虎。第三，对理工科新生进行入校后的数学甄别测试，程度较差些，再补习一年高等数学，然后学微积分。如今，一些高等学校舍不得给大一安排高水平的教师也是相当普遍的，这对培养人才是极不合算的。当年清华的物理、化学等系还采用一年级新生加倍录收，到二年级再筛选留系的做法，对此虽有争议，但从重视选苗，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着眼，对培养合格人才也曾获得益处。

清华大学有浓厚的学术空气，教师中广泛开展的科研活动，吸引着学生也积极地参与。学校经常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校做报告，及时引入、交流科学信息。我是新生，理科大一课程已经很重，记得也听过北大地质系美籍教授格罗布和丹麦量子力学专家、世界科学名人玻尔的学术讲座；还参加过俞平伯教授等组织的戏曲清唱会，虽非都能听懂，也开阔了眼界，大有裨益。记得清华当年有个制度：教授教学四年，可公费出国作一年科学考察，可以就所从事的专业课题与国外同行切磋交流，有的在国外大学进行客座讲学。这使

清华的许多教师能够跟上世界科学前进的步伐，有的处在先进行列。

在清华园的学习仅历一年，而且是80多年前的事了，今日的记忆只是当年清华的只鳞片爪。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清华大学，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

各类优秀人才，其规模以及所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经验，都是今非昔比的。

今年我已年届百岁，在清华108周年校庆前夕，我衷心祝愿母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2019年4月

我走过的人生路

○朱森林（1948—1949 社会）

我今年89岁，明年就是90岁了，到了人生的边沿上。我有幸生活到这个新时代，一个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新时代。现对我走过的革命的人生路作一些回顾，作为我对党的培养、教育和母校的感激之情的一个汇报。

清华学子，报国有门跟党走

1948年夏天，我考取北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报考外语系，入校后改读社会学系），由上海清华校友会组织，乘坐招商



朱森林学长近影

局的“执信”号轮船北上，途径辽东半岛，有人指点说，对面就是解放区。当晚，就有人跟我们接触，向我们宣传解放区的情况。那时，我年纪还小，虽也读过一些进步书籍，但认识不深，满心都是去大学求知求学的欢喜。

进入渤海湾，船颠簸得厉害，晕船的同学躺在船舱里。我不晕船，从船头到船尾来回走。我们睡在甲板上，海水经常溅湿了被子。经过一夜航程，目的地天津塘沽到了。

下船后，迎接我们的是一批清华同学，他们热情地帮我们运行李、上火车。在天津码头，我结识了化工系的陈宜焜，他负责接待帮助我。

当时的清华大学被誉为“蒋管区内小解放区”，民主气氛浓，爱国学生运动、社团活动如火如荼。到校不久，在陈宜焜介绍下，我参加了“春泥”团契。

团契最早是基督教青年相互分享和交往的一种传教形式。党借用这种形式来发展进步学生，做学生工作。团契组织的活动有学习讨论、看进步书籍、唱歌、跳集